

七 十 后 治 史 从 稿

金冲及 著

QI SHI HOU ZHI SHI CONG GAO



人 民 出 版 社

七 十 后 治 史 从 稿

金冲及 著

Q I S H I H O U Z H I S H I C O N G G A O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柯尊全

责任编辑:陈 光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张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十后治史丛稿/金冲及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

ISBN 978-7-01-008759-7

I. 七… II. 金… III. 史学-中国-文集 IV. K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7989 号

七十后治史丛稿

QISHIHOU ZHISHI CONGGAO

金冲及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6.75

字数:53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759-7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七十年治史丛稿

QISHI HOU ZHISHI CONGGAO

目录 CONTENTS

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	1
中国传统文化三题	11
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	18
作为世纪伟人的孙中山	42
五四运动：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64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72
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82
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	119
西安事变与 20 世纪中国历史变迁	165
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的觉醒	183
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没有过时	
——《甲申三百年祭》笔谈	188
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192
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	199
蒋介石是怎样应对三大战略决战的？	252
新中国诞生的划时代意义	303
新中国的第一年	314
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28
谈谈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336



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353
周恩来晚年的两难处境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	363
如何推进朱德思想生平研究	367
邓小平和 20 世纪的中国	373
20 世纪中国历程的启示	
——写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	388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403
治学漫谈	408
人物传记中的几个关系	427
人物年谱的编写	
——《张学良年谱》（修订版）序	432
学风问题至关重要	435
谈谈写文章	438
五十年前的回忆	448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的日子	451
我所知道的冶秋同志	458
中国史学工作的重要领导人	468
后学眼中的蔡尚思	471
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序	474
“人生要有追求”	
——悼念龚育之同志	478
暗号是送你一本书	482
同邹兆辰教授谈治学经历	486
难忘的十年	
答《中国历史评论》问	514
后 记	529

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

什么是中华民族？这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者认为可以很轻易地回答：它无非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一个总称。

但人们可以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上存在着不少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它的成员彼此可以承认是同一国家的国民，却未必在民族上认可有一个共同的总称。以往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但曾几何时便土崩瓦解，它的国民从来不把自己都称为罗马民族或奥斯曼民族。拿近现代来说，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的国民，曾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等地区的居民，他们也从没有把自己称为不列颠民族；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国民依然把自己称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格鲁吉亚人等等，没有出现苏维埃民族之类的总称。

可见，中华民族这个被大家认同的总称，并不是同一国家的各族人民当然拥有的名称，更不是某个人所能任意制造出来或宣传而成的名词，而是有着深厚的客观依据，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 本文是作者 2006 年 4 月 21 日在国防大学讲演的主要部分。



一、构成民族的两个要素

要谈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自然先要简单地说一下什么是民族。

什么是民族？前人提出过许多不同的定义，彼此不尽相同。这里不准备再就民族的定义展开讨论，只想说，能称为同一民族一般需要具有两个要素。

第一，它是历史的产物，是在长时间内而不是短期内形成的，是某个人群由于长时期地生活在同一地域或环境中，建立起密不可分的经济文化联系，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尚以至语言文字，从而产生有别于其他人群的一种特殊关系和凝聚力量。如果缺少这个前提，即便是同一国家的国民，也不能称为一个民族。

第二，这个人群的成员之间，经过长期的相互沟通和密切交往，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包括对过去的共同回忆、今天的共同利益和未来的共同命运。否则，它只是一个散漫的人群，很难说已成为一个自觉的完全意义上的民族。

血缘关系，看来不能构成民族的要素。民族并不等同于种族。血缘在民族构成中有一定的影响，但远不能起决定作用，事实上也几乎没有只由同一血缘组成的民族。倒可以说，民族一般是在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主要以血缘为纽带来联结的氏族社会解体后一步一步形成的。

民族，也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否则，汉民族、犹太民族的形成等都无法说明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

二、中华民族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而又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或者叫稳固的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把它称为“多元一体”，这个看法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放眼世界，这种现象如果不说是独特的，至少也是罕见的。

那么多民族能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有着它特定的主客观条件。

先谈它的客观条件。看一看中国的地形图就会发现：中国的土地自然地形成同周围相区隔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单位。它的北面是人烟稀少的沙漠、戈壁滩；西面和南面有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崇山峻岭；东面是大海。

在它的中间，却有一片广阔的空间。青藏高原的青海地区是三江之源。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发源于青海，横贯中国大陆的东西，奔流入海；雅鲁藏布江注入西藏。长江和黄河又都有无数支流。拿长江来说，进入四川后有岷江，重庆有嘉陵江，湖北有汉水，湖南有湘江、沅江、资水、澧水，江西有赣江。秦始皇开灵渠，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连接起来。汉以来同新疆交往的河西走廊，当年有党河和疏勒河两条大河，源自祁连山的雪水（现已近干涸）。几条大河和它们的无数支流，形成密集的网状结构。

历来有水就有生命，就会有农业，有村落、城镇。古代人们交往的最便捷通道就是河流。中国的这种地理条件，特别是密如蛛网的众多河流，使它既在外部同周围相区隔（这种区隔自然不是绝对的），而内部各个地区间又便于长时期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以至相互融合，这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



同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其他三个地区相比较，可以看到：埃及主要靠一条尼罗河，两侧是沙漠，没有大的支流；巴比伦也有个两河流域，但规模比长江和黄河小得多，四周又没有大的屏障，很难阻挡其他力量进入和破坏；印度的恒河和印度河都在北部，并且向着相反的方向流去。它们都缺少中国这样的环境条件。这也许是它们以后发展道路不同的一个原因。

再看主观方面的因素。中国在历史上尽管也存在着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强调整体、综合、和谐，而且尊重事物的多样性，一直有着“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这些理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中国的各族人民之间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是几年、几十年，而是千百年。这样长久的相互交流，已经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特殊关系。长城的关口不只是战场，更多地是“茶马互市”之类的集市贸易场所。中原王朝和各族间常见的“和亲”，如王昭君、文成公主之类，不只是婚姻关系，也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中国民族关系的这种特点，可以举出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清朝政府是由少数满族贵族统治的，对国内各民族，包括人口众多的汉族实行民族压迫。但是，满族入关后两百多年间，经济文化以至风俗习尚已经变得和汉族没有太大差别。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起过最大鼓动作用的口号是“反满”。但革命起来后，除极少几个地方有少量满族人被杀害外，没有出现如今世界上不少地方出现的那种种族仇杀的状况，更没有“种族灭绝”现象的出现，而是很快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这自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因素便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关。

这样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靠短时期

的武力征服和强权统治，而不是靠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以至自然融合，是很难成为稳定的共同体的，更谈不上民族的认同了。而中华民族这个总称所以能为中国各族人民以至海外的中华儿女所认同，正因为它们具有前面所说的那些条件。

三、千百年的历史演进

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体上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几千年来历史的演进，后一阶段是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形成了自觉的认识。

其实，占中华民族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族，所以能绵延不绝，成为当今世界上人数居第一位的最大民族，也是由许多原来并不相同的民族或部族经过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后融合而成的。

从先秦说起。夏、商、周三代，从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大概并不是同一部落前后相续的三个朝代，而是原来并不相同的三个部族交替取得中原支配权而又相互融合的结果。夏原来在河南的中西部 and 山西的西南部。从考古文化来说，主要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商代的来源，以前有青州、冀州、幽州等几种说法，分别指今山东、河北和东北，而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似乎是从今河北中部南下，进入河南，取夏而代之的。它的文化，主要是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周的情况就更清楚了：灭商以前，在今陕西的扶风、岐山一带，并且受商文化的影响很深；灭商后，才把首都迁到丰、镐。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的结果，也逐渐形成一个总称，叫做“华夏”。

有连续的文字记载的东周以后，可以看出：汉族正是由许多未必出自同一血缘的族种融合而成。这种民族大融合，规模最大最重



要的有两次，时间都长达几百年：一次是春秋战国，一次是魏晋南北朝。同它们相对应，前一次，经过秦的统一，接着便出现汉代的大帝国；后一次，经过隋的统一，接着便出现唐代的大帝国。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汉唐盛世也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好，都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族”、“唐人”的名称，也是这样来的。

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一次民族大融合呢？大家知道，夏、商、周时期，在中原的主体部分称为“华夏”，或者叫“诸夏”，那时并没有“汉族”这个名称；在它的四周有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部族（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称呼）。那时候，齐、鲁统辖的地区，就是“东夷”所在（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发展水平并不在中原地区时间相近的仰韶文化之下），春秋五霸中最早称霸的就是齐；楚、吴、越地区的居民几乎都是“南蛮”，所以楚又被称为“荆楚”，它的地域是战国七雄中最大的；秦的兴起，包容了“西戎”的不少部族，以后的力量最强，统一了中国；“北狄”的范围很广，主体留在北方，未必都被融合，但它有一部分进入中原北部，如中山就是“北狄”之国，赵并中山，也把它融合进去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也是吸纳了“北狄”的文化。没有这样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融合，不会出现兴盛的汉朝，也不会有汉族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是大家所熟悉的。五胡是指匈奴（一部分）、鲜卑、羯、氐、羌。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考证：唐朝开国的李渊、李世民的世系，并不出自原来的汉人，而是胡人。安禄山也是胡人。西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像胡琴、胡椒、胡笳十八拍等名词都留传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没有那次全国范围的民族大融合，也就不会有强盛的唐朝，不会有至今在海外流行的“唐人”的名称。

我曾在云南大学见到过他们绘制的一张有关中国人基因状况的图表，最初使我感到很意外。它表明：中国北方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基因相近的程度；同样，中国南方汉族同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这说明不仅汉族是由许多原来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而且汉族同各少数民族也在历史上长期密切交往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血缘在构成不同民族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汉唐以后，元朝和清朝都以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元朝统治者在国内实行严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不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所以他们的统治不到一百年。但它也有重要的建树，西藏就是在元朝正式列入中国版图的。

清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功绩，正是它奠定了中国的疆域。当我们说外国侵略者从中国割去哪些领土时，不是从汉唐或元明的疆域来比较，而是就清朝的版图来说的。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由满族构成。尽管满族在国内享有种种特权，对有些少数民族曾进行过残酷的镇压，但总体来说，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民族团结问题。康熙、乾隆对汉文化的极端重视为大家所熟知。中国历代几乎都修筑长城，来抵御北方民族的入侵，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金朝也如此。康熙皇帝却说不修长城，而在关外的承德修了个避暑山庄。康熙晚年和乾隆每年都有五个月住在那里，并邀少数民族的王公也去那里住，一起在附近的木兰围场打猎。这一方面是显示国威，一方面又是联络感情。西藏的达赖五世去见过顺治皇帝，班禅额尔德尼到承德住过。达赖、班禅转世要经过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驻藏大臣的设置，都是乾隆朝的事情。

我们祖先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贡献还表现在，当西



方列强在“地理大发现”后走遍世界掠夺殖民地时，他们在非洲、美洲、印度等地，都是先在沿海某个口岸站住脚，然后利用当地小邦林立的弱点，各个击破，最后把它逐步并吞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也来到中国，如葡萄牙人到澳门，西班牙人到过基隆、淡水，荷兰人曾占领台湾 38 年，英国人也早来中国沿海试探过，但他们面对的中国不是那种小邦林立的局面，而是一个统一的大国，难以故伎重演。中国没有被列强分割，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回想起来，我们不能不感谢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笔丰厚的遗产。

四、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稳定共同体，是进入近代，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情。

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激起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反抗。甲午战争爆发的 1894 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这个响亮口号，打动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甲午战败的 1895 年，严复写了《救亡决论》，第一次点出“救亡”那个直到抗日战争前中国人共同面对的主题。正是这种共同的命运，把中国的各兄弟民族更紧密地联结成一体。

正式使用“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最早大概是梁启超 1902 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以后，他在 1905 年年初所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七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杨度 1907 年 5 月所写的《金铁主义说》中，更系统地论述了为什么要称为“中华民族”的理由。

“中华民族”这个名称被广泛地使用，是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

以后。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五族共和”成为传诵一时的口号。这年三月，黄兴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不久就改名为“中华民族大同会”。

这以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在巴黎和会上夺占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享有的特权，制造济南惨案等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武力强占中国的东北。他们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并不区别你是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等。东北各族人民面对的是共同的命运，而且单靠哪一个民族都不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当时流行的《流亡三部曲》歌曲中唱道：“分什么你的我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正是日本侵略者这个反面教员，大大增强了中国各族人民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割出去，激起了“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救亡运动高潮。正是在这一年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呼声。这首歌唱遍了海内外有中华儿女存在的各个角落，抒发了人们的共同感情。

全面抗战爆发后，更增强了中华民族这种凝聚力和认同感，没有任何人能够排除在外。1937年8月，巴金在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呐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点感想》，文中写道：“一个人的生命是容易毁灭的，群体的生命就会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换句话说，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全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日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



从这样简单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到：中华民族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公认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也不仅有着地域、文化等方面原因，而且由于彼此间存在着共同的历史回忆、共同的现实利益、共同的未来命运，把他们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它是在千百年历史中形成的，因此也必将长期地存在，谁也无法人为地把它取消。

（原载《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

中国传统文化三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封建文化的同义语

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看作同义语。持有那种看法的学者有时引用一句名言作为立论的依据，那就是：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的思想便是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话并没有错，但如果由此引申出前面所说那种结论，便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事情至少要看到还有另外一面。中华民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育了几千年，能够绵延不绝，始终不散，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并且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很长时间站在世界前列，这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多见，一定有它的原因。

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漫长岁月的社会实践中，特别重视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从总体上认识人同环境的关系，逐渐形成一整套为多数人接受的道理和习尚。这不是哪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凭空编织出来的，也不是少数人所能强加给所有人的，必须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人们在社会实际生活的“磨合”过程中，经过长期积累，逐渐形成某些“游戏规则”，成为当时人

^{*} 本文是作者在澳门大学的一次学术报告。



们共同认可的是非尺度和行为准则。这是一种社会需要。它的最初产生，甚至在有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没有这种共同的“游戏规则”，社会生活就无法维持和运转。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用比较史学的眼光写道：“可以说，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摩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确实给我们留下许多好东西：比如崇尚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自己，“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省吾身”，诚信，廉洁奉公，“慎独”；对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而不同”，“三人行必有吾师”；看待周围的事物，“天道有常”，“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民间谚语中也有许多好东西，如“人穷志不穷”，“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将心比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民族的这些优秀传统，在不少方面并不能说只是封建主义的产物，而是人们从长期实际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深深地影响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所以能几千年生存发展、没有中断而在今天又能重新复兴的重要原因。

当然，即使是祖先留下的东西里面也有消极的，特别是同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内容，如等级观念、男尊女卑、故步自封等。这些，直到现在仍有不小的影响，应当剔除或逐步改造。它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到近代更已大大落后于世界的进步。这就更要求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对传统既继承又批判，不断加以发展。